



“新革命史”视野下山东革命根据地研究的再出发

——“第一届山东革命根据地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学强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全国敌后战场中唯一一个以一省行政区域为主体的根据地,被毛泽东誉为中国革命“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又为全国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为进一步深化山东革命根据地研究,2018年4月21日至22日,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沂蒙文化研究院)与《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山东革命根据地史学术研讨会”在临沂大学举行,来自日本爱知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海内外7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研讨会。

本届研讨会围绕“革命与建设”这一主题,将革命、建设与根据地乡村社会变迁纳入研究视野,以历史连续性的视角,就“建设中的革命”与“革命中的建设”进行了深入研讨,内容涉及政权建设、报刊宣传、社会动员、财政整理、货币斗争、社会治理、乡村建设等诸多方面,其中不乏以新视角、新视野、新范式观察问题,利用新方法、新资料、新手段分析问题,运用新框架、新体系论证问题的上乘之作。现予分类综述如下。

一、关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及其历史经验。中国石油大学张福运《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一文,全面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研究状况,指出深化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研究一方面可进一步提炼社会动员与整合的技术、策略与经验,另一方面通过区域性比较、下沉研究重心和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方法,探讨中国共产党建政施政的内在机制和制度建设的实践逻辑。

中共山东省党史研究室邱从强《摭论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执政为民及其现实启迪》一文,梳理了山东抗日民主政权执政政策和执政实践,指出山东抗日民主政权执政的历史经验对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群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启迪。山东省党校王凤青《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述论(1940—1943)》一文考察了山东省战工会的创建、运行和发展过程,认为:山东省战工会成立后围绕山东复杂的抗战形势,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移风易俗等方面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对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中共赢得民众拥护支持及党的优良作风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地基层政权—乡村政权的改造与建设在根据地建设中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信阳师范

学院孙启正《山东抗日根据地村政改造与建设析论》一文,考察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村政改造与建设实践。认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村政改造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多重因素的制约,村政改造并未彻底完成,凸显出基层权力变迁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临沂大学苑朋欣《沂蒙抗日根据地的村政改造》一文认为沂蒙抗日根据地村政改造的深入、全面开展,对提高村干质量,激发村民参与政治和抗战的热情,推动根据地经济、文化建设,实现中共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控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盐城师范学院曾凡云《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以乡选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以乡选为中心考察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指出华中抗日根据地乡选中虽存在不足,但通过乡选巩固了根据地的政权,为中国共产党探寻基层政权建设之路提供了重要经验。

注重调查研究是党的优良传统,山东根据地在探索民主改革和政权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调查统计工作。临沂大学许汝贞《山东革命根据地的调查统计制度建设》一文考察了山东根据地调查统计制度建设,指出:山东党组织和根据地政权不仅在各级政权机构中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调查统计管理体系,同时发布了一系列加强调查统计制度建设和指导具体工作的指示,在调查统计制度建设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关于根据地干部队伍建设和“肃托”问题。本次研讨会多篇论文涉及山东根据地的干部管理政策、干部群体自身分析、干部之间矛盾及其处理等方面。

滨州学院张业赏《抗战时期山东“肃托”原因探析》一文认为,山东发生“肃托”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央对“托派”的错误定性是根本原因;山东党组织夸大“托派”在山东的组织和力量,一度将“肃托”作为锄奸工作的中心是直接原因;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特殊性和锄奸工作体制不完善是重要原因;对知识分子干部的怀疑不信任、刑讯逼供、干部素质低下等是具体原因。山东“肃托”及纠正、平反的过程充分说明,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才能避免错误的发生,保证事业的健康发展。湖西“肃托”是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发生的规模最大、错误最为严重的肃反事件。北京大学郭宁《干部矛盾与湖西“肃托”的发生》一文从分析干部之间的矛盾的视角入手,认为湖西“肃托”的发生与干部群体的内部矛盾密切相关,是中共干部群体内部矛盾的一次爆发;外来知识分子新干部与本地老干部的矛盾是“肃托”的导火索,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矛盾成为主线,最后矛盾扩大到主力部队内部,导致一大批干部被错打成“托派”。

山东大学黄润青《问题意识的构建与变迁:山东根据地基层干部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一文,认为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的干部政策是不断回应现实问题的动态过程,在每个时期内中共都针对干部工作中的核心问题构建问题意识,设置特定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每个问题的解决,推动干部工作的发展。

南开大学孙健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县长群体:以滨海区为中心的研究》一文认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县长队伍既承担着革命与建设的双重角色,对地方政权发展、生产建设、社会治理和基层改造做出了重大贡献;另外,部分县长身上体现出的党性修养、工作方式等问题和不足依然是困扰中共进行干部队伍建设的“难题”。

南方医科大学王微的《性别视域下华北革命根据地女干部角色认同困境考察》一文,从性别史的视角考察了华北革命根据地妇女干部角色认同遭遇的困境。她指出,妇女干部作为中共队伍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革命与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1942年刘少奇山东之行,历来的研究都给予了全面肯定。清华大学郭芷材《1942年刘少奇入鲁与山东领导结构的调整》一文,认为刘少奇的山东之行拉开了山东领导格局大调整的序幕,同时也大大提升了罗荣桓的威望与地位。

三、关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社会治理。在中共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研究方面,与会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财政整理、货币斗争、生产救灾等方面。

根据地的村财政整理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山东大学齐廉允、徐畅《“嵌入”管理:山东根据地村财政整理新阐释》一文,借助“嵌入”概念和嵌入性思想剖析山东革命根据地1942—1949年的村财政整理工作。认为山东革命根据地在村财政整理工作中建立了嵌入式的村财政管理模式,财权与事权趋向统一,乡村财政关系得以规范,农民负担有所减轻;同时,整理村财政是中共为取得战争必需资源而采取的一种战时财政动员手段,也成为新中国国家政权干预、监管农村财政的滥觞。山西大学原汇蓄《太行解放区村财政整理之考察(1946—1949)》一文,考察了1946年太行解放区村财政整理过程,指出太行区是当时整理村财政较有成效的地区,但仍存在整顿不平衡与规章制度无法有效落实的情况。

货币金融是山东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货币斗争对山东根据地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爱知大学名誉教授马场毅《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通货政策》一文,综合使用《北海银行史料》、日本方面有关金融史料,考察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通货政策的演变以及最终在通货上统一使用北海银行的过程。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郭本意《敌乎?友乎?抗战时期国共的“铸币权”之争:主要以山东地区为例》,使用大量国民党方面的史料,以北海银行为中心,从争夺“铸币权”角度考察国共之间的斗争。他指出,山东地区在延安的指导之下,建立了以北海银行为核心的银行体系,通过发行辅币占领广大农村市场,进而发行本位币,逐步统一了山东全省的货币流通,最终将法币逐出山东,取得了货币战的胜利。山东师范大学钟钦武《效用与偏差:抗战时期北海银行农贷活动探究》一文,考察了抗战时期北海银行农贷活动,认为:由于战争环境、资本缺乏、银行程序不健全、工作人员经验不足、贪污、人民认识偏差等原因,北海银行农贷工作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和偏差;北海银行在解决这些问题和偏差的过程中,逐步规范农贷工作,将农贷融通农业金效用发挥出来,促进了山东根据地农业的发展。

同济大学万立明《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科技事业的措施及其成就探析》考察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科技事业的政策、措施和成效,认为:各级组织高度重视科技事业,制定了相应的科技政策和措施,这些做法及取得的成就对于解决山东抗日根据地经济困难,坚持持久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根据地社会治理方面,中共中央党校高中华《黄河归故之争:两党三方的博弈》一文侧重考察黄河归故之争背后的多方博弈。国共两党围绕黄河归故之争展开的较量与博弈表面是国共两党在黄河治理方式上的矛盾,实质上体现了国共两党不同的救国理念。聊城大学邓广《何以解民困?——1948年春山东解放区政府灾荒应对的考察》一文,以1948年春山东解放区政府的灾荒救济为例,研究了中共政府救灾的措施、过程及其效果,指出在政府的强力推行下,农村实现了仅有资财的平均,大部分农民勉强渡过了灾荒。

四、关于根据地的文化宣传及其革命效应。报刊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南开大学李金铮《读者与报纸、党政军的联动:〈晋察冀日报〉的阅读史》一文,站在读者的视角,对《晋察冀日报》的读者群、受众面、获取报纸的渠道、读者的阅读方式、编读互动、读者阅读后的思想和行为变化等进行了深入的阅读史研究。

山西大学岳谦厚《“党报姓党”的实践逻辑——基于〈抗战日报〉的一项微观考察》一文,以中共晋西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为研究分析个案指出:中共报纸的创办发行是一种“深入的组织工作”,以报纸为平台在中共政权与根据地社会之间寻求共识,实现共振,形成共振,从而谋求民众对中共的政治支持。

红色报刊中蕴含着根据地政治、军事、文化等建设的大量素材,是研究根据地各项事业发展状

况的重要载体。中国石油大学王克霞、赵冉《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以〈大众日报〉为中心》一文指出《大众日报》通过配合和宣传整风运动与冬学运动,表彰英雄楷模等实践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其成功经验对新时代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北京印刷学院高杨文的《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报刊研究》,对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报刊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在中共各级组织的领导下,山东根据地构建了由省、区、地、县四级组成的党报体系,发挥了思想宣传、组织动员、文化建设、服务大众四种重要作用。湖北美术学院吴继金《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抗战美术宣传》认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抗战美术宣传活动,在鼓舞抗日军民的革命斗志、动员民众奋起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艺术武器作用。山东师范大学刘本森《红色报刊中沂蒙精神文献整理的提出与构想》一文,提出要重视《大众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因为这类红色报刊中包含大量沂蒙精神研究的素材。

还有学者以新文化史的视野探讨根据地的文化宣传及其社会效应。淮北师范大学李军全《塑造“新人”:抗战时期中共节庆话语中的民众形象》,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节庆话语对根据地“新人”的塑造过程。山东大学方允《“造就好公民”:山东解放区荣誉军人安置问题初探——以“七七”荣军节为中心(1946—1949)》指出解放战争时期荣军节的设置,增进了荣军群众观念,提高了荣军社会地位。

五、关于根据地的社会动员。关于根据地的社会动员,具体涉及政治动员、生产动员、支前动员、妇女解放等方面的研究。

土地改革运动的宣传、组织和动员一直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热点。山东大学杜武东《从“私仇”到“公斗”的建构:吕堤事件研究》一文,考察了1947年春季冀鲁豫区“吕堤事件”的过程,指出中共在土改运动中塑造的二元对立的阶级观念,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鲁东大学杨焕鹏《舌尖上的革命:中共在胶东抗日根据地饮食叙事》,以战时中共围绕“食物”而进行的革命叙事为中心,以舌尖上的“革命”为主题,指出满足下层民众对食物的渴求,无疑是中共在基层动员革命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它贯穿于中共革命整个过程的始终。

“群众工作”是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概念,群众工作的本质就是社会动员。临沂大学张学强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群众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从社会动员的视角考察山东抗日根据地群众工作,指出中共在开展群众工作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群众观念淡薄、违背群众工作路线、漠视群众利益、不能融入群众中间等一系列“问题”,中共正是在不断克服这些“问题”,改正自身缺点错误的过程中,才逐步赢得民心,走向成功。

领导发展生产是中共在根据地的重要任务之一。临沂大学魏本权《1949年山东沂蒙专区的春耕生产动员》一文,剖析了中共在农业生产领域中为何领导生产、如何领导生产以及“生产必须领导”所带来的双重效应,认为会议动员、文化动员、经济动员、政治动员综合交替运用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与领域,构成了沂蒙解放区生产动员的基本方式。

妇女解放运动本质上属于社会动员的范畴。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张艳芳《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解放运动》一文,指出共产党通过组织妇女参战、参政、生产、学习及开展民主斗争,促进了广大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使之开始关心国民前途、民族命运;它使广大妇女能够和男子一样参加抗战民主事业。

民站是战争时期中共在后方运输线上设置的民工后勤保障机构,被称为“后方的后方,支前的支前组织”,是解放区后勤保障工作的一个缩影。临沂大学张红云《“后方的后方”:淮海战役期间山东解放区的民站》一文,考察了淮海战役期间山东解放区民站的建立过程,认为在民站的运作过程中,科学合理的制度与规范虽然极为重要,但人的因素更具决定意义,群众的组织发动贯穿民站

运作过程的始终。

六、现代中国革命与建设其他相关问题。本次研讨会与会学者还就大革命时期中共游民政策,苏区时期的富农问题、保甲秩序,九一八后中共的华北建军尝试、红军长征记忆与历史书写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渠桂萍《试析 1926—1927 年湖南农民运动中中共游民政策的起伏》一文,考察了湖南农民运动中中共游民政策的变化过程,认为中共的游民政策左右摇摆,与中共的游民政策尚未成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错误指导等因素密切相关。赣南师范大学曾耀荣、刘魁《近代乡村贫富分化与中共富农问题的提出》一文,考察了近代中国乡村贫富分化与中共富农问题的提出过程。赣南师范大学刘魁、曾耀荣的《报复、统战与暴动:苏区时期中共对保甲秩序的突破》一文,考察了苏区留守红军和国民党地方保甲政权之间的关系演变。北京大学张永的《1932 年北方会议与中共华北建军尝试》,考察了 1932 年北方会议后中共尝试华北建军的经过。指出这些尝试虽然都遭遇挫折,但在华北扩大了中共的声威,在北方军队和地方社会中散播了很多革命种子,建立了不少关系网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华北的崛起打下了基础。山东大学孙雪《书写历史——中共长征记忆与话语生成(1935—1949)》一文考察了 1935—1949 年间中共在根据地时期书写的长征记忆和历史书写,认为中共充分运用政治和文化资源,通过文本书写、宣传教育和纪念活动等方式,从政治、精神和美学层面对长征进行了丰富多元的阐释与解说,增强了中共历史叙述的神圣性和影响力。中共将长征与民众的朴素情感和道德标准相联系,赋予其道德教化、行为规训和情感号召的功能和意义,使长征这一政治军事行动逐步成为意蕴深厚、鼓舞人心的英雄史诗,为其日后成为植根于全党全军全民的共同历史记忆提供了基础性的话语资源。

“建设告竣时,革命成功日”,革命与建设本就是 20 世纪中国的两大时代主题。南开大学王先明《革命与建设:20 世纪中国的历史主线与问题》考察了 20 世纪中国历史演进中革命与建设的关系,革命是 20 世纪初的主题,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建设的主题开始呈现;革命与建设并非对立,建设的历史远远长于革命的历史。江西师范大学万振凡、陈莎考察了熊式辉主政时期的民国江西乡村建设运动,认为乡村建设措施在许多方面对江西农村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经过多年乡村建设的努力,江西农村落后的状况并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齐鲁工业大学徐舒映《新组织构造: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组织建设》一文,考察了山东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从理论和具体设计上对乡村组织的努力。太原理工大学杜慧《抗战胜利后“现代农建”诉求的新转向——以中国建设协会为中心》考察了抗战胜利后“现代农建”由倡导以工业化为本位的农业现代化转向谋求农业生产关系合理化的过程。南开大学谢健《多维张力下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融合与碰撞: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新都实验再探讨》一文,考察了民国时期四川新都实验县乡村建设运动开展过程,认为时局、地方社会与国家政策这三种因素对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最为明显。

总体上看,此次研讨会论文绝大多数均围绕山东革命根据地研究主题,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干部队伍、报刊宣传、社会动员方面的讨论相对集中、深入,在研究方法上凸显了“新革命史”研究的新取向,展现了“新革命史”研究视野下山东革命根据地学术研究的新视角、新进展和新成果。具体说来,研讨会论文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注重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角度分析问题,注重革命史和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此次研讨会论文如根据地村政改造、村财政整理、社会动员、日常生活等研究均试图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研究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复杂面相,揭示中共革命策略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张力。

第二,凸显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问题意识是研究创新的关键,会议论文中对干部矛盾问

题、妇女干部性别角色认同问题、党的群众工作问题、根据地建设引发的社会关系变动与调整等的探讨,都聚焦于战争、革命与建设中的问题和矛盾,考察其解决的复杂历史过程,实现了论题和研究的创新。

第三,注重新材料的发掘利用。此次关于北海银行研究的两篇论文大量使用日本方面的金融史料和国民党方面的档案资料,在资料运用上有了新开拓。武汉大学薛毅的《抗战时期焦裕禄被掳至伪满当矿工经历初探——对山东沦陷区平民命运的个案考辨》,考察了抗战时期焦裕禄被掳至伪满当矿工的经历,对战时沦陷区平民命运的关注即体现出对新材料的发掘与运用。

第四,注重以历史连续性的视角“打通”不同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史研究。本届研讨会的部分研究论文非仅限于抗日战争时期,前延与后展的学术探讨也相当深入。《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认为现有的成果往往局限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研究,未来应以历史连续性的视角,加强革命根据地史贯通性的研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江沛教授也指出,加强中国革命与山东根据地的研究极为必要,应以服务地方、展望全国、国际合作的视野与思路进一步拓展深化山东革命根据地研究。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兴胜教授强调了山东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以及在服务地方、服务山东中的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本次研讨会论题相对集中,研讨富有成效,成果较为丰硕。当然,部分会议论文在理论观点、分析视角、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上仍显创新不足,对国外学者的最新研究进展关注尚且不够。但理论创新没有止境,学术研究也永远在路上,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对深入推进山东根据地史研究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张学强,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沂蒙文化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